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把战争制胜机理真正搞清楚

■朱小宁

引言

当前,全军掀起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研究热潮,在此过程中,关于制胜机理的概念有许多不同提法,存在不规范、不准确等问题。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前提条件是厘清其概念,否则研究起来往往会不得要领,更谈不上指导军队建设与作战运用。

制胜机理重在揭示作战路径

什么是制胜机理呢?

首先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突破巴列夫防线说起。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突破以军防线,埃及军队在登上苏伊士运河东岸后,派工兵用高压水枪冲刷以军的沙质防御工事,一旦制造出小缺口,就用炸药和推土机扩大缺口,在不到10个小时内,打开数十个可容坦克通过的缺口,彻底突破以军巴列夫防线,取得作战初期主动权。其中,突破防线包含的制胜机理是,突破沙质防御工事,可以通过高压水枪冲刷方法,其理由是沙遇水后很容易散,这是一个常识。

这是战役层次的制胜机理。战略层次的制胜机理,如现代战争将以往的攻城略地转变为对目标民众意识的全面战略控制,理由是可能造成敌战争系统因“空洞化”而崩溃;战术层次的制胜机理,如炸桥需要把炸药放在桥的重心上,理由是这样才能将桥最大程度炸毁等。由此推论,制胜机理就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根据敌作战体系的“脾气”,为战胜敌人而提出的作战路径及理由。其中,作战路径,规定作战力量的作用指向,即打敌人作战体系哪里,才能打准、打疼、打瘫它。理由就是选择作战指向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有其可靠的道理及依据。如“打击重心”制胜机理,界定作战力量指向为敌作战“重心”,其理由为重心是敌作战体系各要素相互作用与联系的“枢纽”,打击它更容易破坏体系、瘫痪其战斗力。

作战力量是一种矢量,由方向和大小共同决定,其战斗力能同样由方向和大小共同决定。制胜机理要转化为现实,作战力量只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等达成足够优势时,才能在特定的作用方向上真正战胜敌人,即“力量优势原理”。这是战争制胜的普遍规律,我军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拿破仑关于“军事艺术的秘密在于在必要的地方和必要的时间,使自己的军力超过敌人”等,都反映了这一原理。如联合作战的基本思想为: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其中,信息主导反映了信息

化战争的本质要求,而后面两项则揭示了信息化战争的制胜机理,精打要害说明作战力量的指向,联合制胜则强调通过联合形成力量优势。

可见,制胜机理=“作战路径及理由”+“优势原理”,其重点在于界定打击敌人的路径。

厘清制胜机理概念有利于战争研究向纵深发展

目前,关于制胜机理的概念有许多提法,但大多未能准确反映其本质。通过厘清制胜机理概念,可以化繁为简,驱散认识和研究中的各种迷雾与阻力,促进制胜机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化解“胜道”迷雾。关于制胜之道有许多说法,如《孙子兵法》中的“速战速决”“以地为助”“知己知彼”“彼竭我盈”“以镞称铙”等多种制胜之道,正在提出的有集效聚优、并行联动、自适应协同、破击制胜、战术设计制胜、精神震撼制胜、欺骗制胜、突发性制胜等,可谓种类繁多。根据“作战路径”制胜机理,可以将制胜机理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作战路径的,界定作战力量的使用方向,如打击重心、体系破击等;一类是关于塑造力量优势的,界定作战力量的大小,如突然、快速、精确等,这样便于对现有制胜机理多种提法进行比较分类,破解复杂性迷雾。

辨析相关概念。其一,“内在原理说”。一种说法认为,制胜机理是指制胜的路径及理由,但将机理的“理”和理由,理解为自身作战体系构建与运行的内在规律与原理,而不是采用此作战路径的理由及依据。其二,“机制”说。认为制胜机理,是作战体系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整体合力、实现对敌制胜的内在机制,如,集效聚优机理、并行联动机理等,将机理与机制混为一谈。其实,机理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机制则是机理的实现方式,两者是决策与行动的关系。其三,“特点”说。认为信息化战争所呈现的一些特点,实际上就是制胜机理。其实不然。制胜机理,是对战争特点及具体战争情况进行思维加工后所形成的产品。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经过综合分析我抗日战争的

本质特点后,才洞察到我抗日制胜之道,形成正确的战略指导。

力避细节纠缠。“作战路径”制胜机理概念的提出,认为制胜机理研究需要从整体上、全局上、全过程加以对敌作战体系进行研究,根据其“脾气”寻找破敌之法,而不强调一下子具体到细节,被作战活动各个细节所纠缠,导致作战指导、作战方法缺乏针对性。如“机制”概念说,将制胜机理研究拖入具体的作战体系内在机制与规律的纠缠中,影响了对真正制胜机理关注的注意力。因而,在制胜机理的研究中,一开始不应太多关注细节,而是尽力寻找制胜的路径与方法,只有将机理机制化时,关注细节才有价值。

体系对抗孕育的现代战争基本制胜机理

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决胜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需要从系统整体角度来认识。

体系破击。将敌作战体系的整体作为切入点,运用系统论的构建与分解原理,通过对其关节点、关键信息流程等“体系命脉”进行破击,使之发生系统还原反应,引起作战体系功能等级的降低以至衰竭,实现“巧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其中,作战力量发力的指向,是敌作战体系的关节点、关键信息流程等“命脉”,理由是结构决定功能,作战体系结构瘫痪,作战体系功能势必崩溃。“混合战争”的制胜机理也是体系破击,其原理是通过混合手段和方式,使敌体系功能紊乱而被动挨打。

极限施压。对敌作战体系进行封锁、挤压等,使其无法与外界实现信息和能量交换,从而使其作战体系熵无限增加导致混乱、无序,作战功能渐渐失去。其中,作战力量作用的重点是封锁、挤压,其理由是作战体系无法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而崩塌,类似与蛇捕捉猎物后,总是缠绕着猎物,并通过收缩肌肉,慢慢使猎物窒息而死。

降维打击。将敌作战体系本身所处的空间维度降低,致使系统无法在低维度的空间中运行从而毁灭。其中,作战力量使用重点是打击敌作战体系的内在机制,如,集效聚优机理、并行联动机理等,将机理与机制混为一谈。其实,机理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机制则是机理的实现方式,两者是决策与行动的关系。其三,“特点”说。认为信息化战争所呈现的一些特点,实际上就是制胜机理。其实不然。制胜机理,是对战争特点及具体战争情况进行思维加工后所形成的产品。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经过综合分析我抗日战争的

耐力竞速。主要是对敌战争忍耐力、战斗意志进行打击,使其放弃战争或战斗,其中作战指向是袭击对方人员、装备物资等,其依据是可以消耗敌方战斗意志和支持战争的决心,迫使敌方政治态度变化。此机理多应用在非对称冲突中,如在越南战争中,越南的战术是想设法给美国人造成伤亡,而不大考虑他们自己的代价。结果,使美国的战争意志产生动摇,最后不得不撤兵。

探索具有自身特色制胜机理的主要方法

恩格斯指出,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下出发,循着错误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探寻现代战争制胜机理,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解剖解制”方法。探索制胜机理,应解剖典型战例中失败一方被击溃的真正原因、“最后一击”是什么等,为发现制胜机理提供线索和分析框架。与一般的战例研究不同,探讨制胜机理的案例解剖,重点是败者如何失败,战斗力如何下降,而不是胜者如何成功,由此找到失败方如何崩溃的本质原因。

“量身定制”方法。制胜机理,有理想条件下的一般机理,如以上提到的几种路径,但具体到每个战争场景中,就像一场战争的“指纹”一样,需要“量身定制”。不同的作战体系、不同的时空条件等,其制胜机理并不相同。因制胜标准受技术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制胜机理有时对一种敌人有用,对另外一种敌人却未必有效。美军有“一次性作战理论”一说,其原因就在于此。

“净评估”方法。净评估概念的关键是找出战略竞争方的强点、弱点等,以确认需要高层战略决策人员关注的问题和机遇。敌我优势劣势、强点弱点,是制胜机理的生长点。可运用净评估方法,在对抗环境中,客观全面分析敌我双方作战体系系统要素、结构及运行方式的优劣、强弱,本着放大敌人的弱点,倍增自身的强点,识别与确认制胜的路径及道理。从敌人的作战理论中寻找弱点,也是探寻制胜机理的重要途径。

“类比借用”方法。现代社会中,存在很多竞争场合,从动物界的猛兽猎食,从拳击、篮球、足球比赛,到商业竞争案例,都包含赢得竞争主动的路径及理由,从而为探索制胜机理提供了启示。如柯达达公司被挫败包含高维降维攻击机理等。制胜机理研究,应善于借用自然科学、经济社会、生物界的一些现象和概念,然后加以拓展应用。

群策集

二战期间,英美军方为减少伤亡、提高战机防护力,对作战后幸存飞机上的弹痕分布进行研究,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在哪里加装装甲。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关注弹痕少的部位。他认为:第一,统计的样本,只涵盖平安返回的战机;第二,被多次击中机翼的战机,似乎还是能够安全返航;第三,在机尾的位置,很少发现弹痕的原因并非真的不会中弹,而是一旦中弹,其安全返航的概率就微乎其微。最终,军方采用了沃德的建议,并于后来证实其建议是正确的。这就是著名的“幸存者偏差”,反映了“当取得信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容易导致统计结论产生与实际不同的偏差”。

战场上,排兵布阵、筹划决策是作战行动顺利实施的关键,应重视从“幸存者偏差”中得到启示,从看不见的地方进行逆向思维,善于“反其道而行之”,从而达到出敌不意的作战效果。

否定势,逆经验之向。受生理特点影响,人的思维一旦产生在长时间内建立起强有力的神经联系,形成一种特别“回路”,使人不由自主地用过去的老办法、老经验来应付当前局面。尽管经验思维有时能使人跳脱思维阶段,提高决策效率,但由于它易受先入为主的模式支配,往往容易使人陷入思维定势。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用密集火力成功压制德军炮火不久,遭到不知来自何方的一颗炮击破坏性打击。苏军观察员提供了该地兵连的几种可能位置,并指示炮兵进行炮火压制。可德军炮火并没有停止,仍然给苏军造成重大伤亡。后来发现,德军炮兵指挥官将火炮架设在河上,苏军自始至终未对河流进行炮击。由此可见,经验思维存在直线性和片面性,指挥员要想谋划周全、决策无误,必须摆脱“纯经验主义”的束缚,丢开思维定势的包袱,从反向、立体、全面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问题。

换位,逆角度之向。战争史告诉我们,最大的不可能之处常蕴含着最大的可能性,兵家之“机”往往隐匿于兵家之“忌”。经常换位思考,站在对手的角度考虑问题,分析找准敌人弱点、掐住敌人命脉,才是最高境界的“知敌”。

苏联卫国战争前夕,朱可夫元帅曾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德军将要行动的计划,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方法。”做出“敌人只能这样”的判断,进而服务于己方的筹划决策,正是换位思考的结果。战场较量从来不是一方独舞,而是相互之间的斗智斗勇,见招拆招。把对手研究透,掌握他们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优势,分析对手对我作战体系的评价和我斗争潜力的评估,忌惮我们哪些领域和环节,惧怕我们以哪种方式,在哪个方向展开攻击,等等。唯有如此,才能

从「幸存者偏差」说开去

■艾正松 孙建军

确保我们在筹划决策上“胜敌一招”。

破常规,逆利害之向。孙子曰:“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战场上敌我瞬息万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要想在万千变化中抓住核心关键,就应善于权衡利弊。然而,战场上没有绝对的有利或绝对的有害,筹划决策最重要的就是打破惯性思维,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利害,甚至于在趋利避害的基础上反向思考、变害为利。1945年远东战役前夕,日军统帅部出于对“雨季、沙漠和原始森林不适合机械化重装集团行动”的考虑,未对大兴安岭方向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戒备。与此同时,苏军大规模作战行动偏偏违反了常规,不仅把进攻时间选择在处于雨季的8月上旬,而且命令主攻坦克兵团从蒙古东部翻越大兴安岭,重兵直逼日军设防重地,打得日军一败涂地。正所谓“反弹琵琶曲更决策”,充满着逆向思考、变害为利的筹划方针,总能在出敌不意间赢得作战行动的胜利。

如何提高军队作战适应性

■闫晓峰 蒋艳

观点争鸣

广泛的作战适应性是军队应对未来复杂战争环境的重要能力。提高军队作战适应性需要构建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指挥方式和力量编成,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塑造高弹性军队结构,强化复杂条件下组织适应能力。随着战争复杂性、不确定性空前提高,军队越来越需要嵌入更加柔性的组织结构,以应对多样化威胁和多变环境。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高弹性军队结构,具有攻防兼备、软硬兼具、运用灵活等特点,成为更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组织形式。因此,应打通树状结构壁垒,深度融合多样化职能,强化横向工作流程贯通,促进形成网络化军队组织结构;灵活设置领导指挥层级,根据作战需求从战略层向下灵活延伸至不同层级,克服逐层指挥效率较低的弱点。

构建分布式指挥方式,强化作战行动异地自主协调能力。现代战争瞬息万变,作战任务的“决策—行动”周期大幅压缩,迫切需要提高作战单元自主行动能力及其相互之间的自适应、自协调能力。随着智能技术在作战指挥领域的广泛运用,以网络化、智能化为中心的指挥控制方式不断发展,也持续推动指挥方式由集中向分布式指挥与集中指挥的关系和时机,依据不同作战任务类型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区分决策空间,分类明确作战规划、目标分配、火力打击等权限划分;完善分布式指挥、自适应计划和控制系统,探索战略、战役、战术行动协调统一的指挥控制体系,为一线指挥员自主机动实施作战指挥提供支撑。

创新一体化编成样式,强化多元作战职能集成能力。随着作战方式的创新发展,对作战指挥体制、武器装备等领域的联合程度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在力量组成方面不断加强融合程度、融合范围和融合效能,构建形成更加一体化的作战力量体系。因此,一方面应推动新型作战力量深度融入传统作战力量体系,将太空、网络、陆上、空中等作战力量融为一体,探索新型作战力量编成样式,充分释放新质作战效能;另一方面,应建立集无人自主、隐身、高超音速等功能于一体的作战力量单元,着眼综合应对高中低端多样威胁,将传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等高维作战力量与反无人机、反卫星攻击、网络防御等应对新型威胁的作战力量融为一体,产生全域覆盖、攻防一体、灵活多样的多功能涌现效应。

打造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强化联合作战全域互联能力。网络信息体系是集相关系统、要素、力量、机制于一体的逻辑功能体系,是保障联合作战指挥和领导管理活动有效运转的基础。未来战争形态下,联合作战力量体系基于网络互联,全维态势感知基于网络共享,多域作战能力基于网络互连,联合作战行动基于网络协同,可以说没有智能自主、高效运行的网络信息体系,就失去了克敌制胜的根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推动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拓展立体网络布局,推进军事大数据建设应用,加快传感器建网、武器装备联网、作战力量入网,为智能化、精确化作战提供全面网络支撑;另一方面,应区分不同领域,构建集中领导、结构稳定、精干高效、运转流畅的体系化管理链,统一指挥、并行筹划、跨域协同、智能控制的一体化指挥链,灵敏感知、自主决策、精准打击、全球联动的智能化杀伤链,促进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链路互联互通、形成合力。

沙家店战役:扭转西北战局的转折点

■贺煜

战役简介

1947年七八月间,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相配合,机动歼敌。为了牵制敌人,配合外线部队作战,陕北我军出击榆林,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第一次榆林战役之后,于1947年8月18日至20日在陕西米脂县沙家店地区进行的一次运动歼灭战。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师部及2个旅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基本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从此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中共中央在8月21日《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转变》的指示中,高度评价了沙家店战役对西北和全国战局的重大意义。

讲评析理

布设疑兵,隐蔽企图,变被动为主动。蒋介石,使敌人产生错觉和误判,而后出其不意,是改变敌我优劣势,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沙家店战役发起前,我军虽经过第一次榆林战役达成了调动敌人主力北上之目的,但

自身处境仍然困难。从地理环境来看,北有沙漠,东有黄河,西、南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军,侧水侧敌为兵家之大忌;从敌我兵力对比来看,敌强我弱;从双方所处态势来看,敌处主动我处被动。为在战场上争取主动,我军果断撤回榆林,将主力隐蔽集结于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待机,以小部分兵力引敌继续北进,并以一部分兵力掩护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葭县东渡黄河向山西转移,制造我军主力渡河的假象,从而使蒋介石、胡宗南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军主力已经败退,无力作战,并准备东渡黄河,遂令其所属各部“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我军在充分掌握分析敌情后,决定利用追敌之路钟松部骄横失慎、孤军分兵冒进、长途跋涉的弱点,抓住战机,诱敌进入有利于我歼灭的预设战场,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敌整编第36师主力,从而扭转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集中兵力,选择弱敌,运动中分割围歼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军事原则,也是我军化劣为优、以弱胜强的根本方法。沙家店战役,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的“清剿”部队约6万余人,而我西北野战军仅有4万余人,且刚撤围榆林,尚未得到休整补充,后勤补给也很困难,明显处于劣势。但我军采用避开其主力,打击其

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孤军冒进一路的办法,使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敌整编第36师,虽系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装备精良,但该师此次进占镇川堡只有师部和两个旅(四个团),且远离主力,长途跋涉,疲惫少粮,严重减员,战斗力明显下降,与刘戡所率之敌主力相比,是个弱敌。此外,敌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自恃援榆有功,刚愎自用,在本是孤军的情况下分兵冒进,从而为我军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捕捉围歼提供了难得战机。为此,我军除用一部兵力牵制阻击敌主力外,以野战军主力将敌整编第36师分割包围,在具体打法上又分为两步: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其后梯队师部及第165旅(欠第493团),然后再转用兵力歼灭其前梯队第123旅(配属第493团)。这样,我在局部战斗中均构成对敌的绝对优势。

抓住战机,机断行事,保证达成全歼之战役目的。对运动之敌的进攻,情况变化很快,要求各级指挥员在上级总的意图下发挥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

快速机断行事,才能适时抓住战机。在沙家店战役中,我教导旅的任务本是配合第2纵队歼灭主力整编第36师师部及第165旅(欠第493团),但当该旅进至常家高山附近时,发现回援之敌第123旅(配属第493团)正与我新编第4旅争夺常家高山制高点,敌为夺占这一要点,拼尽了全力,战斗异常激烈,而这一制高点距敌主力战斗的常庄南山较近,如被敌占领,不仅严重威胁我第2纵队翼侧安全,且两敌会合一处,将直接影响到战役任务的完成。该旅指挥员基于上述情况,果断定下与新编第4旅协同歼敌第123旅的决心。此决心经上级批准后,教导旅即以第2团加强常家高山的防御,第1团从右翼迂回,与新编第4旅的第16团密切协同,迅速包围并歼灭了敌人。教导旅这一果敢行动,对于保证迅速全歼敌整编第36师师部及2个旅,夺取沙家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研史析理